

《中国古代宇宙观与政治文化》摘要

09020328 王亮

中国的宇宙观以“关联 (correlative)”为特征，其基于阴阳、四方、五行、八卦等概念进行关联构建。Schwartz 评论中国关联宇宙观类似“具体的科学”，“拟人化宇宙观”，其自然世界中的实体、过程和现象分类与人类世界中实体、过程的现象分类之间，呈对应或“匹配”关系，且中国关联宇宙观作为一个有序的系统，将宇宙中不同的现实领域之间建立起种种对应关系，人类世界各种范畴：人的身体、行为、道德、社会政治秩序和历史变化，与宇宙的各类范畴，包括时间、空间、天体、季节转换，以及自然现象关联起来。而其核心——“五行”系统，其产生与发展展现出宇宙观与帝国形成互相构建的过程。

中华文明传统上的文化遗产：阴阳五行宇宙观（天地阴阳），政治遗产：统一帝国，作为两个最为持久的结构，被 Schwartz 评价为中国式“思想结构”，其作为地道的中国本土原生的文化，成为塑造中国民族认同的重要资源。一直以来，统一帝国的形式被视作中国政治制度的理想模式，而阴阳五行宇宙观亦被历代正史视作亘古不变之理，凌于时间与事件之上，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所谓“五行”即通过五种类别来将其他系统综合化及标准化，作为一种互动和变化的宇宙观，表意五种宇宙能量处于持续的相互作用中，不断相克相生，演变为有规律的循环的序列。五行将事件和行动同五个相互作用的宇宙力量之间无休止的运动和变化关联起来，旨在解释人类世界的事件，及指示人类的行动。然五行的关联宇宙观，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情境，有着不同功能和内涵。且五行的内涵不仅因不同的历史时期而异，而且在同一个社会的不同派系势力亦有不同的应用。在此之上，谈及五行之起源，往往以四方作为其前身，然二者虽有相通之处，然其根本实不相同。David Keightley 提到在为后期的思想溯源时，有忽视或割裂中国早期文化现象完整历史背景的危险。所谓“并非所有的早期宗教现象都一定会在后世中华文化中留下它们的印记”，“对早起中国的任何研究，不仅涉及到我们所知的后世中华文明的起源，而且涉及到中国早期文明的起源。”

在为五行溯源时，应当考虑到，即使早期文化现象能够延续至后世文明（如四方）其最初的含意和功能也极有可能在漫长的历史过程中发生根本的变化，或者被历史的主体改造再生。因此，为文化现象溯源的另一个危险是：忽视后世文化对早期文化符号有目的的借用所带来的演变过程。故不应简单地归咎四方为五行之前身。

五行是一种在历史中不断变化的文化现象、亦是用于政治论辩和权力斗争的话

语，也是处在一个冲突和变化的世界中如何行动的艺术。政治上用五行宇宙观讨论皇权、争夺权力和权威，并界定权力关系与社会等级（非单纯概念 哲学派别 思考模式 表现形式）。从四方到五行，中国宇宙观与政治力量间互相构建，历史进程中文化与政治两份遗产间互动共生，其变化体现出早期中国政治文化的转变。并且中国政治秩序遵守一个基本原则：政治与宇宙观不可分割。

早期中国的宇宙观，正式在当时的权力斗争中发展，其内涵与结构反复受到改造。反过来讲，也没有一种既定的社会政治结构，独立于或先于宇宙观而存在，而宇宙观也不仅仅是政权的反映，用来维护和证明其合法性。无论是青铜时代的夏商周，亦或帝国时代的秦汉，权力关系都是借助宇宙观来加以构建的。宇宙观限定了权力关系和政治行为准则。

宇宙观文化与政治互相构建的过程在四方-中心宇宙观和商政治结构的结合中得到呈现。商政治下“方”代表在政治上和其他政体的疆域界限，而四方的含义拓展为更为全面的、包括政治疆域的宇宙空间结构。“四方”，“方”与四的组合使其超越单纯的政治单位的含意，获得宇宙观的新意。四方代表四个基本方向，界定祭祀和宇宙观的中心。甲骨卜辞中，每方皆有其名，与相关四方风名联系在一起，与风神有密切联系。是禘祭的唯一对象。商代霸权统治借由四方宇宙观得到观念上的构建。四方将生存在外围的（方）、臣服的（候）“它”或“方”与“我”或“中”及商王族区分开来，将神灵、人类、自然力，以及异族政体等宇宙间所有力量按四个基本方向分类。这样的概念上的分割体现在一系列的实践行为中，如商与其他异族政权的多种相互作用：一类（侵、伐、征）占土掠财；一类（呼、令、册）结盟从属；一类（崇、受侑、祸）祝福诅咒；一类（有、来）交易纳贡。亦如商与“帝”的沟通，祭仪等。这样，四方-中心宇宙观构造了商王的政治统治，同时四方本身的内涵，结构和功能又在仪式和政治行为中得到持续的再生和重建。

自商周氏族统治的“青铜时代”之后，经历一个动荡失序的历史转折期，到秦并天下而一统的第一个专制帝国，漫长历史过渡之中，宇宙观和社会政治关系双双变革，相辅相成构成了一场整合的历史进程，重建了当时的社会关系，也改变了人们对宇宙的认知。

周王室衰微，群雄并起，争夺霸权，僭越夺权，取公室而代之，西周基于血缘世系制度而建立的等级和政治秩序逐步瓦解，在旷日持久的内外竞争出现新型社会纽带催生出一批非血缘结构的政治关系同盟。随着组织方法、地方行政、文职官吏的发展，商周

以王族世系为基础的氏族统治终为官吏管理的地缘国家代替。同时藉由祖先崇拜而合法化的世袭王权也让位于宇宙观构建的新君权。

同样的构建过程在秦汉帝国的形成中得到进一步发展。这一过渡时期，正在成形的政治势力动用关联宇宙观，特别是五行，摧毁了霸权国家的中心性。

其中一个方面，宇宙观的道德化和转变便是在数代汉儒的长期努力下完成的。

《五行志》中展示的宇宙观实为秦始皇时期尚武唯刑的五行相克向天之道德宇宙观转化之产物，在道德化宇宙观中，五行服从天之道德，证明和体现天之道德意图，其最终取代秦和汉初正统的五行理论。其因便在于汉儒改革派地位的提高与对皇权的制约，汉儒通过将皇权置于天命、古制和宇宙观的制约下，将皇权的性质转变为汉儒伦理道德理想的载体。从西汉开国之君马上征天下，西汉亡国之君禅让皇权，可见宇宙观和皇权性质的根本转变。可见五行宇宙观模式并非恒久持续的文化模式，而是由恒动的社会冲突不断改造和再造着。皇权同样并非稳定结构，而是承载包容着一统之下的无限矛盾冲突。宇宙观这一文化领域和皇权这一政治领域不断互动互生，二者构成同一个动态变化的过程。

在古代中国，宇宙观和权利的整合于一体，体现出多面的特点，这意味着其拥有诸多内涵和功能，反映出众多不同的立场。此外，五行宇宙观并无其物质形态，无固定结构，无固定内涵，唯有流动变异的内涵，不断更换的结构，在日常实践的各种各样的表面重复中存在着。于秦始皇而言，五行代表征服与暴力，于刘向王莽等汉儒而言，五行服从并体现天的意志。再度印证五行非恒久文化模式，而是不断在社会冲突中被改造，再造。

宇宙观，从四方到五行，从来不是中国思维下一种单纯结构，其自始至终都与权力紧紧绑在一起。宇宙观系统地阐述了权力关系，同时又在权力的斗争中经受了构建和改造。五行亦代表政治领域高度动态和复杂的关系，宇宙观构建的皇权成为了宇宙的中心和帝国权力的轴心，它作为的唯一中心，纵向连接天、人、地，横向联系各种政治、社会关系网。宇宙观在实际上成为权利的一种必要成分，其所展示出的宇宙秩序的概念体现在权力竞争、军事征战、政治统治、社会等级，以及暴力等方方面面。宇宙观作为一种政治话语，提供了独特的场地，让围绕皇权的、中央集权与地方主义之间的、自然力量以及道德权威的之间种种争辩冲突于此频繁上演。